

876.21

9822

(2)

瓦尔鲁编

巴黎公社诗选

巴 黎 公 社 詩 选

瓦 尔 鲁 編

沈 宝 基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LES POÈTES DE LA COMMUNE

(Choisis par Jean Varloo)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1.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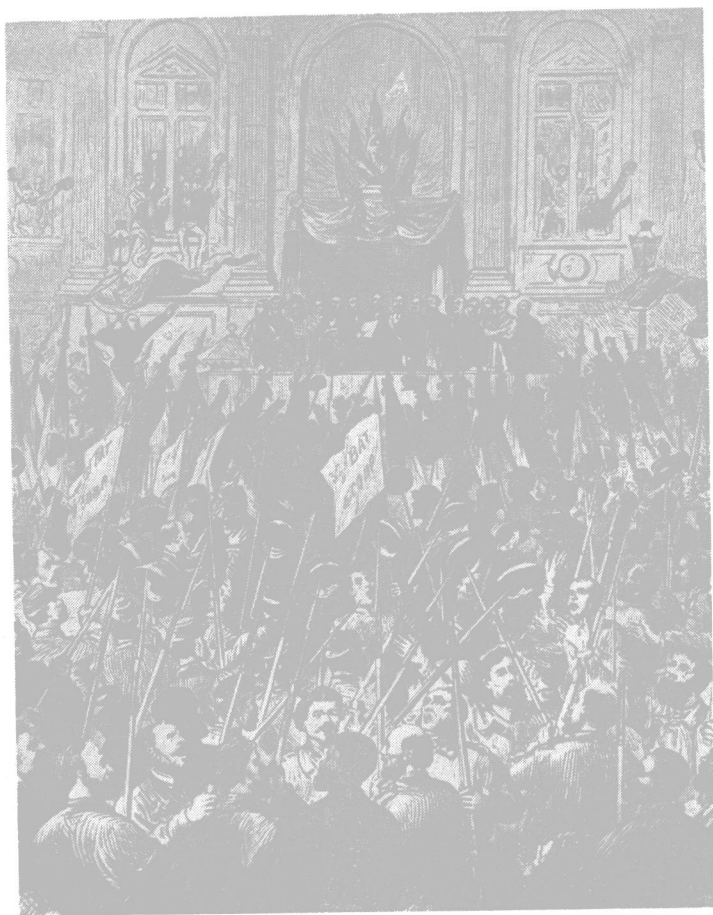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书号 551 字数 133,000 开本 850×1163 耗 1/32 印张 $6\frac{1}{16}$ 插页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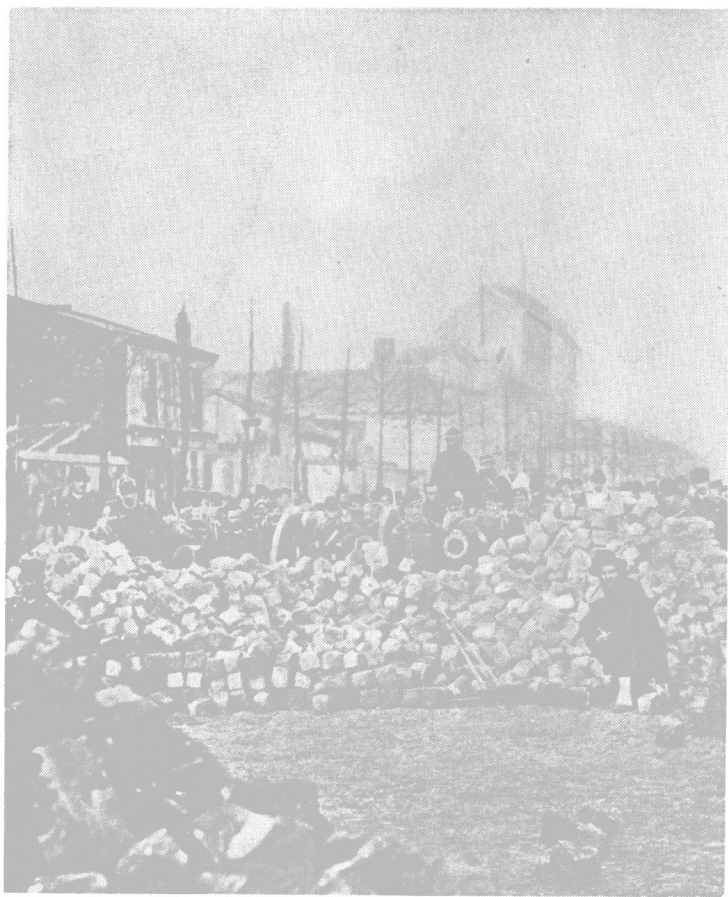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7) 0.80 元



1871年3月26日舉行的巴黎公社選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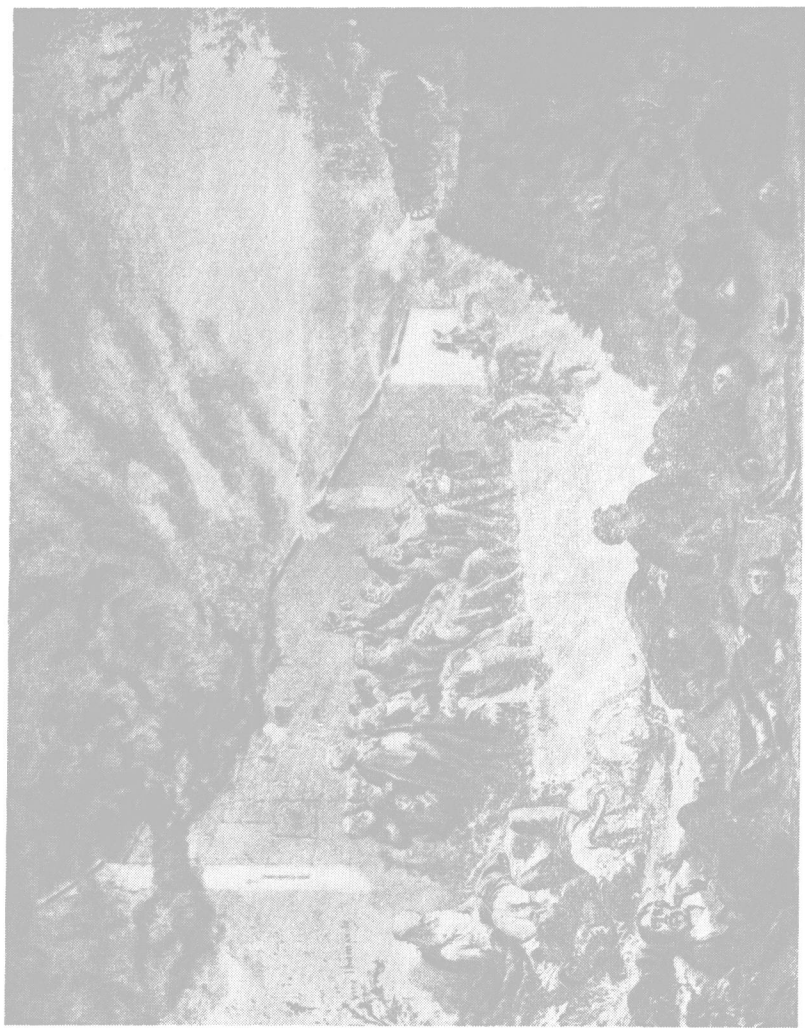
巴黎人民準備戰鬥，在街道上建築了防禦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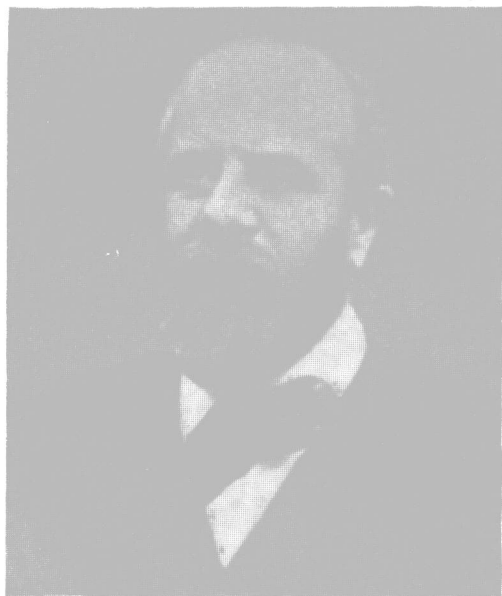
在戰鬥中的巴黎公社社員



在最後戰鬥中的公社女社員



許多公社社員就在這座牆下被害。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公社社員牆”。



“國際歌”作者 鮑狄埃像



“國際歌”作曲者 特蓋脫像

序 言

什么都比不上砲火中的巴黎那样光辉，
什么都不如起义的巴黎那样面貌纯洁。

这是阿拉貢在一九四四年歌頌巴黎的兩句詩。韓波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后第二天，也向这經過多次大革命的城市这样說道：

詩人向你說：“你的‘美’何等光輝燦爛！”

暴風雨使你有崇高的詩意。

詩人的熱情就是人民的熱情的崇高表現。最偉大的詩人是代表所有真正的詩人講話的。因此可以說，凡爾賽分子中間沒有詩人。

他們只有后膛槍和機關槍來“維持秩序”，但是機關槍不能抑止人民的呼聲和那些幫助人民早日實現未來社會的詩人的歌聲。一九一七年十月曾經鼓舞俄國革命黨人的鮑狄埃的“國際歌”，就在一八七一年六月凡爾賽分子血腥鎮壓之際寫的，這件事是具有莫大象征意義的。^①

應該讓革命傳統生氣勃勃地存在下去，讓過去的作品不致湮

沒無聞。由於凡爾賽分子在文化方面，至少在学校中傳授的文化方面，把这些作品認為煽動叛亂的文章，統統加以清除，因而全世界流傳最廣的法國詩歌“國際歌”，在任何法文教科書中都不能找到。我們人民在各个时代所創作的和歌唱的所有革命歌曲都遭到同样的命运，甚至一七八九年、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詩歌也不例外。

我們的責任是要收回这份遺產。在整个革命詩歌还未加系統整理以前，我們要向讀者先介紹这几位巴黎公社的詩人：由於他們的作品的数量大、內容丰富，並且往往具有“党的文学”的性質，所以巴黎公社的詩人在革命詩歌的系統中佔着头等重要的位置。

在这篇序言里來敘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歷史是不必要的。卡尔·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战”一書以及列寧的“國家与革命”的主要的兩章，已把事件的經過和教訓分析得非常透澈，任何作品都不能出其右。我們只提一件事，就是一八七〇年拿破崙三世糊里糊塗向普魯士宣战而遭遇到的失敗，正如馬克思預料到的那樣，招致了九月四日的革命而推翻了第二帝國。但資產階級組成的所謂“國防政府”，在共和國成立以后，非但一点也不適應法蘭西全國人民在侵略者面前的愛國熱情，反而效法賣國賊巴柴納之流的波拿巴派的將軍們的榜樣，准备投降。國防政府害怕武裝的工人階級，它任憑巴黎在六个月的圍城期間內堅忍地受盡飢寒，然後和敌人簽訂了可恥的和約——壓迫階級的和約；這顯示出資產階級和敌人一鼻孔出氣，商量好要實行階級統治。這是第一次合作。到了一九四〇年这种合作的意义更是暴露無遺。

但是資產階級為了要讓勞動人民負擔戰爭的代價，就必須摧毀巴黎，那個人心激昂、要求成立公社、自己出來實行民主的巴黎，武裝的巴黎。三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的夜間，梯亥爾打算出其不意，解除巴黎的武裝。這一陰謀的失敗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在这次革命中，各種情緒都交織在一起：祖國蒙受恥辱的心情，對凡爾賽議會和梯亥爾政府中那些賣國賊的憎恨，以及工人階級的革命熱忱。無產階級已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奪得了政權。

巴黎公社就它的議會的成員來說原是很複雜的，所以当巴黎公社建立起一個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的新的國家形式的時候，起先表示支持的資產階級共和黨分子和小資產階級便背棄了它。但是巴黎公社由於它的卓越的領導者——工人、第一國際的成員的力量，却仍能在七十二天的生存中完成了一樁驚天動地的偉業。正如列寧所說的：“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終究發現了的’使勞動底經濟解放可能實現的形式。”②

馬克思也說：“巴黎公社偉大的社會措施，就是它自身的存在及其行動。它所採取的各種辦法，無非顯示出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發展方向。”③

凡爾賽資產階級政府下了決心，要用槍砲和流血來消滅這次革命，因為它覺得具有歷史重要性的這次革命，對於它未來的統治非常不利。這是一場野蠻的戰爭，在戰爭里被俘的巴黎公社社員都被槍殺，隨後是：在浴血的一週中，巴黎一區一區地被佔領，街壘上面和後面以及貝爾·拉雪茲墓地里的人們集體被屠殺，堪為夏多勃里昂和納粹集中營作榜樣的沙多里集中營的設置軍事法庭的成立；運氣好的人，亡命國外，而另一些人却被放逐

到新喀利多尼亞^④去。這些被流放的人一直要等到九年之後，法國工人運動恢復了力量，才能於一八八〇年迫使資產階級共和國下令赦免。

但是巴黎公社的成績，在世界工人階級的歷史中是肯定的。卡爾·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致顧格曼的信內曾說過：“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的鬥爭，因巴黎的鬥爭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管其直接的結果如何，一個有世界歷史重要性的新出發點是已經取得了。”^⑤

*
* *

巴黎公社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有沒有反映在七十二日和後來的年月中呢？可以答复是反映了的，特別在詩歌方面，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這方面的收穫。

然而不要忘記這些作品是在什麼條件之下寫成的。

在七十二天當中，巴黎公社的許多詩人都擔任政治或軍事任務，沒有時間創作。他們至多只能在報刊上發表一些文章。此外，巴黎公社不懂得組織書刊的工作，又由於普魯東派的成見作祟，不贊成必要的沒收和征用，這對工人出身的詩人說來是特別不利的。這就是為什麼當時沒有出版一本詩集的原因。在當時，詩歌，包括雨果的在內，要在報章雜誌中才能找到；或者是印成散頁傳單的形式。詩歌是在工人俱樂部中朗誦，在路角歌詠，在戰壕和街壘里合唱。許多作品現在已經找不着了，有燒掉了的，有藏起來的，有被搜走的，有為了避免遭殃自己銷毀的，譬如韓波的“巴黎的情人”和“巴黎的死亡”兩首詩始終沒有下落。可是圍城時期和七十二天內的作品留傳下來的為數仍然頗為可觀，仍

可以当作一些很好的例子(我們現在正在这样做)來說明逐日記錄下來的这种詩歌的情况。这种詩歌有时慷慨悲壯,有时激烈地諷刺和攻击凡尔賽分子,它常常含着笑意,永远充滿了生活的愉快,它有男兒的豪气和对無產階級必然勝利的強烈信心。这种詩歌从來不脫离当时的实际問題,一步一步地和巴黎公社在一起作战,而且为了巴黎公社而作战。多数作者對於我們是陌生的。其中有几位想必是在浴血的一週內巷战时牺牲了。

可能有人認為在屠殺的惡夢中,流放的困苦中,以及監獄和苦役的慘酷中,詩歌不会有生气,而是在奄奄待斃。但是我們知道早在六月里就已祕密產生了鮑狄埃的“國際歌”;此外尚有讓·巴·葛萊蒙的“浴血的一週”,这是顯示出詩歌頗有前途的兩首斗争和复仇的好詩。沙多里集中营里,也出現一种集体創作的抒情詩:一种押韻的口头報導,葛洛維斯·于格的“獄中歌”曾提到这个,而現在所保存的僅是一些断章殘篇。于格、路易治·米雪尔等詩人,虽然他們困难很多,要受定期的搜查,但仍然寫下了大量作品。路易治·米雪尔在法庭上叱責了審判她的人以后,仍然寫作,悲痛革命的失敗,呼喚复仇的日子和再一次革命的日子來到。

在新喀利多尼亞時,路易治·米雪尔繼續寫作;除她以外,尚有几位男同志如亨利·勃理沙克,也寫了一些比較簡單而能感動人的作品。他們還辦過地方報刊,但此後並沒有人認真加以研究,他們的作品想必大部分已經銷毀。

在詩人流亡時期,詩歌較前發達。被放逐者最初受到可能被引渡的威脅而後又受到物質上的困難,他們起了分裂,有時不免互相殘害。

魏尔迈雪的情形是令人痛心的：从政治方面講，可以拿他的長詩“放火者”为証，他是不坚定的；虽然不能肯定他替法國警察服务，但我們的印象却是如此。在倫敦时他給魏尔倫的影响不能是別的，無非把这和他同样不坚定的詩人引向否定的立場，这在“战敗者”一詩中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有了沙德倫、查理·鮑奈、爱瑪奴埃尔·特劳尔姆、葛萊蒙、鮑狄埃等那样進步的詩人，以上的这些缺点也就無所謂了。这些詩人不管創作的灵感变得如何悲痛，但和当时流放者的心情一样，总保持着勇敢的乐观主义；为七十二日政治經驗所丰富的灵感，始終热烈地为回到祖國的怀抱和新的巴黎公社的勝利而斗争。虽然有扫射的机枪，有凌辱，刑罰和飢餓，但詩歌到处仍在生長，而且充滿了烈火一般的热情。

在这同一时期（一八七一——一八八〇），資產階級的詩歌却陷入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因而正如人們正确所指出的一样，开始大形衰落。只有雨果——上昇的資產階級欣欣向荣时期里的老战士，和葛拉底尼二人，根据資產階級本身已經否認了的原則，來为流放的巴黎公社社員爭取大赦而斗争。这种努力是以一八七一年雨果贈給路易治·米雪尔的“比男人还偉大”一詩开始的。他的态度沿着詩集的進展而日漸明顯，但还应该特別感謝他，因为可以說只有他一人，不顧以他目标的威脅和惡意的攻击响应了一个巴黎公社社員——特洛爱尔——的号召。他能够保持自服尔泰到左拉和阿那托尔·法朗士的傳統而不使中断。他的詩歌，如“歷代傳說集”中的那几首：“費理皮恩伯爵”，“內战”，特別反映出他对不幸者的憐憫，对劊子手的憎恨以及他要和人民在一起的無限的，然而模糊的決心。

等到工人階級自己出來為大赦而鬥爭，大家在集會中便唱起鮑狄埃、葛洛維斯·于格和奧里維埃·蘇埃特爾的詩歌。因而詩歌又從鬥爭中合法地或不合法地湧現出來。于格歌頌了被判徒刑的脫倫蓋，因為他獲選為貝爾維爾的代表。一八八〇年爭取大赦的鬥爭終於獲得勝利，巴黎公社社員在熱烈歡迎之下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們大多數下定決心繼續鬥爭。那時他們的任務是竭力宣揚巴黎公社的功績，為巴黎公社辯護，駁斥像馬克西姆·杜岡、小仲馬、沙爾賽、高貝之流的無恥的毀謗。

巴黎公社的詩歌似乎又復興了。終於深入到人民最廣大階層的這種詩歌，再一次創造了巴黎公社的形象，而且用熱烈的號召，真誠的力量，強烈的信心，說服和鼓動那些丟開資產階級文學的悲觀主義和形式主義而來到它的旗幟下的青年。直到那時，魏爾倫才認為可以把韓波收在他的“被咀咒的詩人”集中。

在這個繁盛時期的詩歌中，首先應提到鮑狄埃、于格、葛萊蒙、沙德倫等那些重要詩人費盡氣力始能出版的詩集。葛萊蒙於一八八五年刊印詩歌集的時候，年已五十，而鮑狄埃本人自一八三四年^⑥起不再發表任何作品，幸有同志們的熱心幫助，才出版了他的“革命詩歌集”。

除了這些老戰士外，尚有其他詩人出現。某些是巴黎公社時代的人，但是當時沒有寫下任何東西留給我們，他們後來才積極寫作，例如奧里維埃·蘇埃特爾、阿希勒·勒洛亞、喬治·潑洛圖、席洛爾·理查等便是這樣。在他們之後又出現一批更年輕的詩人，如保羅·勒陶奈、特蓋爾（即約克·格）。所有這些詩人對於我們幾乎都是陌生的。他們的作品刊載在報章雜誌，如“社會問題”和“社會主義雜誌”等刊物里面。從數量方面來講，特別是